



扫二维码，关注新华每日电讯

中国版“敦刻尔克大撤退”之地：国运决定城运

全民抗战爆发81周年之际，话宜昌前世今生

宜昌地处湖北省西南部，古称夷陵，因“水至此而夷，山至此而陵”得名。清代改称“宜昌”，取“宜于昌盛”之意。除了吴蜀夷陵之战、赵子龙大败长坂坡等三国故事外，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，地处内陆的夷陵，大多时候只是一个“默默无闻”的城邑。

1938年秋，中国为持久抗战而进行的物资与人员大撤退，在宜昌紧张地进行。从此，这座城市的城运与战火纷飞时的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本报记者完颜文豪

宜昌江边的“宜昌大撤退”纪念雕塑。摄影：本报记者完颜文豪



仲夏时节，傍晚的宜昌江边，市民或独自一人或三五成群地悠闲散步，一片不大的沙滩上聚集着嬉戏打闹的家长、小孩和几只小狗，游泳爱好者在滔滔江水中来回穿梭，老年人干脆搬了一把椅子，坐下来静静地观看江中美景。

江面横卧着一座三塔斜拉桥。北侧桥头旁，一座9米高、15米长、3米厚的雕塑，外观如扬帆航船，又如长城垛口，上方立着一只巨大的船锚。

80年前发生在这里的一场大撤退，让这座内陆城市跃上历史风云的潮头，并因此载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史册。

宜昌地处湖北省西南部，古称夷陵，因“水至此而夷，山至此而陵”得名。清代改称“宜昌”，取“宜于昌盛”之意。除了吴蜀夷陵之战、赵子龙大败长坂坡等三国故事外，在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上，地处内陆的夷陵，大多时候只是一个“默默无闻”的城邑。

1938年秋，中国为持久抗战而进行的物资与人员大撤退，在宜昌紧张地进行。从此，这座城市的城运与战火纷飞时的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。

在之后的战争烽火中，这个在清末一度繁荣的转运贸易中心开始走向衰落。这座城市，为保存中国抗战力量作出了巨大贡献和牺牲，也因此被国人熟知、为世界闻名。

滚滚长江见证着一座城市的繁荣、衰落与振兴。

“川鄂咽喉、西南门户”之称的宜昌，成了战时国家工业物资和人员向后方撤退的中转站。

80年前，以今天雕塑的位置为中心，沿着长江上下游各两三公里，江边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帐篷，沙滩上堆积着大箱小箱的机器设备，岸上拥挤夹杂着东北、华东口音的人群。

李泉是个土生土长的宜昌人，青年时听着父辈们讲述1938年秋季的宜昌，想象着国土渐次沦丧中国人逃难的情景。20多岁时，他每次试图在脑海中拼出那时的画面，“内心都深受震动”。

1938年10月，“以空间换时间”战略下的武汉会战，最终以武汉的沦陷结束。300公里外的宜昌，原本只有10万人的城市，涌进3万多名难民，从城区到江边，大街小巷挤满了人，所有的旅店、客栈、学校被住满后，不少人只得栖身屋檐下或露宿街头。

焦急等待“换乘”入川的人群中，有一万多名随工厂转移的工程技术人员、300多名金陵大学教授职员和学生，包括陶行知、老舍、李四光、曹禺、张大千、赵丹等一大批社会名流，以及源源不断撤回的负伤将士以及难以统计的难民……

中国实业史上的“敦刻尔克”

1938年秋，宜昌数公里长的江滩上，已被亟待转运的货物拥塞得水泄不通。而在长江上空盘旋的敌机，已开始对宜昌展开疯狂的轰炸。

10万吨军民工业重要机器设备，3万余名工人、难民，急需转移入川。然而，当时宜昌以上的长江上游河段运输能力极为有限，能在这段河道行驶的只有民生公司的22艘轮船和两艘外轮，而民生公司单船运载能力只有200—600吨，按这样的运力计算，将全部物资和人员转移至重庆需要整整一年时间。

更为严峻的是，10月中旬以后，长江上游适宜较大轮船航行的中水位，只剩40天左右，过后便是漫长的枯水期，大型设备便无法入川。

40天内，要完成需要一年时间的物资人员转移，这无疑是一场与时间赛跑的抢运。

1938年10月23日，在中国薄弱的工业基础存亡之际，民生公司总经理卢作孚等到了宜昌，组织指挥这场炮火下的抢运。

这位当时的“中国船王”，在1925年以艰难筹措来的少量资金，订造了一艘70吨的内河小轮船，创办民生公司。经过他的悉心经营，这家公司很快发展成为川江轮船航运业的劲旅，与美国等外国轮船公司展开竞争，航线从四川省延伸至长江全线，成为当时中国最大的民族航运企业。

1938年10月10日，民生公司成立13周年的纪念会上，卢作孚苦口婆心地对公司员工说：“中国抗战到了这个时候，最重要交通线只有两条，一条是粤汉铁路，一是川江。川江运输，民生又占大半。我总是希望大家继续为国家努力，为公司努力！”

时至今日，李泉仍清晰地记得父辈们讲述的那段往事，“卢作孚带着公司一群人，沿着长江上游游走，最终确定了三段航行方案。”

为了缩短运输时间，从宜昌到重庆的撤退被划分为三段进行，宜昌至三斗坪为第一段，三斗坪至万县为第二段，万县至重庆为第三段。在卢作孚的计划中，每艘船以吃水深度、马力大小为基本依据，在不同的河段航行，根据船只情况充分利用河道，实现最大运力。同时，这场抢运动用了850多只民间木船。

10月24日，第一艘满载物资和人员的轮船起航，离开宜昌港。此后，一艘艘轮船向上游进发，转出清华大学与中央工业实验所的机器、钢铁厂矿的大型设备，生产军需物资的工业材料……

著名剧作家吴光祖一家人，也在从宜昌撤退入川的船上，妹妹吴律在一篇文章中，回忆当时的情景：在上船的码头上，呈现在眼前的是一幅让人

紧绷心弦的“逃难”场景，人山人海，扶老携幼，万头攒动，一望无边。前面的人大路上，挤满了人群黑压压一大片，站在船边的更是不敢动弹，稍一不慎就会跌落在江水之中，蒙蒙秋雨无情落下，人多，伞难以撑开，不少人只好听凭雨淋……

在这场大撤退中，除了民生公司的员工，宜昌倾城之众、数万码头工人、海员、船工和纤夫，投入其中。硝烟弥漫的宜昌码头，敌机轰鸣声、爆炸声与搬运行号子、纤夫呐喊声交织在一起。

在卢作孚的统一指挥下，这场转移3万多人和10万吨物资的大撤退，仅用40天时间就胜利完成。

相关资料记载，从这场抢运之后，直到宜昌沦陷，宜昌港累计转运了150余万难民以及100万吨物资。参与抢运的民生公司，在运输中损失轮船16艘，116名员工捐躯、61名伤残。

亲历宜昌大撤退的教育家晏阳初评价说：“这是中国实业史上的敦刻尔克，在二战外战史上，这样的撤退只此一例。”

受父辈们的影响，青年时期的李泉，就幻想着能通过什么方式，让这场大撤退成为这座城市的记忆。多年后，任职宜昌市政协主席的他，终于把这段往事镌刻在了江边雕塑上，曾经的幻想变成了现实。发生在80年前的宜昌大撤退，以雕塑和碑文的形式矗立江边，成为这座城和一代又一代宜昌人的集体记忆。

据宜昌市档案馆(馆)馆长袁清介绍，通过宜昌大撤退抢运入川的机器设备和技术人员，很快在西南和西北建立起一系列新的工业区，尤为重要的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军工、炼钢等行业的综合性工业区，构成抗战时期中国的工业命脉，为中国抗战保存了重要的有生力量。

新中国成立初期，毛泽东在谈到中国工业发展时，曾讲过有四个人不能忘记：讲到重工业，不能忘记张之洞；讲到轻工业，不能忘记张謇；讲到化学工业，不能忘记范旭东；讲到交通运输业，不能忘记卢作孚。

清末宜昌：“帆樯如林，蔚为壮观”

翻开宜昌城市变迁史的卷轴，这座临江而建的城市，因地处长江航运的中转站，曾经历过百年的商贸繁荣。

当时间倒退回19世纪中叶，作为川鄂间重要的水运枢纽以及长江中上游航运的衔接点，宜昌有着“超载码头”之称。川米、滇铜、黔铅、棉花、药材等大宗货物，都要经由宜昌转运出去。

据三峡大学教授、宜昌地方研究所所长李敏昌介绍，从太平天国以前，湖北省规定只准准卖淮盐，太平军攻克武昌后，淮盐西运路线被切断，川盐开始取代淮盐行销湖北、湖南地区，此后川盐成为出川货物中最大的一宗，“川盐济楚”使得宜昌港的转运贸易变得空前繁荣。

宜昌市档案馆珍藏的清末宜昌照片中，一只只贩卖货物的木船，密密麻麻地停靠在江边。史料对宜昌的商贸繁荣也有着直观的记载，江面上“帆樯如林，首尾相接，蔚为壮观”，城外码头“日有千人摇橹，夜有万盏桅灯”。

1876年《中英烟台条约》签订后，宜昌被辟为对外通商口岸。之后，西方列强租界地，设领事馆，开洋行，建教堂，城区逐渐发展扩大。曾经人迹罕至的一片坟场，变成了繁华的解放路商业区，江面上铁轮取代了木船，数不清的中国棉花、布匹远销海外，一时间形成万商云集之势。

19世纪末期，依水而建、因码头而繁荣的宜昌，从“规模不甚宏廓，商业亦不甚茂盛”的“荒寒之村市”，一跃成为长江航线上最重要的转运商埠和湖北三大商业城市之一。

抗战之前，这座城市已有73种商业、2032家商户，形成南北25公里、东西约半公里，大小街道260多条的商埠区，成为在湖北仅次于武汉的

第二大城市。

李敏昌认为，正是由于宜昌地理位置优越和繁荣的商贸，吸引了追逐利益的西方列强，促成了英国人在宜昌开埠，而不是倒过来说西方列强在宜昌开埠促成了宜昌的兴起。

因战争而衰落

宜昌市东山公园，也是这座城市的烈士陵园，园内的一个小山坡上，郁郁葱葱的绿树围着一座红色亭子，上书“东山草堂”，亭内石碑上写着“抗日名将张自忠将军纪念碑”。

1938年10月开始，当卢作孚的轮船装满工业物资和人员到达重庆后，这些船又在重庆满载出川奔赴前线抗日的兵员顺江而下。

宜昌地处长江三峡西陵峡口，“上控巴蜀，下扼荆襄”，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。武汉沦陷后，宜昌成为拱卫陪都重庆和大西南的最前哨。

1940年4月中旬，日军调集15万兵力，企图将中国军队第五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(枣阳、宜昌)地区。为了阻止日军进犯，第五战区确定分左中右三个集团军，采取“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，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，相机与日军决战”的方针，并调集6个集团军，共21个师56个团的兵力参加作战。此次会战，史称“枣宜会战”。

5月7日，第五战区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将军，率部东渡汉水，强攻日军后方。激战数天后，5月16日，张自忠在宜城长山山坡下，身中数弹，壮烈殉国，成为中国军队在抗战中牺牲的最高将领。

张自忠将军的遗体从战场上被抢运回来，灵柩停在宜昌东山公园的东山草堂。公祭活动后，灵柩经过战区到达江边再送回重庆，沿途送灵群众多达十万人，日机在空中盘旋，“送殡者缀队以行，庄严沉寂，整齐无比，视敌机盘旋蔑如也。”

在今天的东山草堂旁，一排纪念碑上，镌刻着社会各界人士题写的挽词——尽忠报国、为国捐躯、勋烈常昭……

1940年6月12日，宜昌沦陷，日军在城中焚掠房屋五天五夜，从城市毁灭的程度讲，“破坏之甚，为全国冠”。

据《宜昌市志》记载，1940年6月，宜昌沦陷区人口仅剩21400人。抗战胜利后，城区人口仅存2000余人。此后，撤离大后方人员陆续迁回，到了1947年，城区人口为78000多人。

日军的侵略，让宜昌这个曾经的长江转运贸易中心，走向了持续多年的衰落。

两座大坝，两次振兴

进入6月份，三峡大坝景区，到了中午，气温迅速升至30多摄氏度。炙热的空气却并没有打消游人的兴致。

拥挤的脚步拾级而上，到达景区最高点坛子岭，伴随着一阵阵快门声，这座世界上最大的水利枢纽工程，成为众多年轻女孩自拍的背景，也进入外国游客相机的镜头。

因葛洲坝和三峡大坝的兴建，宜昌实现了两次振兴，步入大城市之列。如今，它又承担了建成省域副中心城市、长江中上游区域中心城市和世界水电旅游名城的历史使命。

上世纪60年代中期，由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国防的需要，中央决定实施三线建设，在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，开展大规模的工业、交通、国防基础设施建设。

其中，西南的云、贵、川和西北的陕、甘、宁、青俗称为“大三线”，湖南、湖北、河南等一二线地区的腹地俗称为“小三线”。地处长江中上游的鄂西城市宜昌，成为湖北“小三线”建设的首选之地。

此后，一大批工业企业内迁至宜昌。与抗战

时的工业西迁不同，这次宜昌不再是中国中转站，而是目的地。

落户宜昌的三线建设单位，涉及电子、机械、化工、化学、航海、航天等行业的军工企业和科研院所等，使宜昌地区成为当时我国重要的战略后方基地。

在李敏昌看来，新中国成立是宜昌走向新生的开端，三线建设让宜昌从一个消费性城市逐步向工业城市转化，“因为直到1964年，宜昌的工业还是由小钢铁、小机械、小化肥、小煤窑、小水泥等作坊式企业组成，三线建设给宜昌带来了精良的技术和设备。”

1970年12月，葛洲坝水利枢纽工程在宜昌动工，历时18年工程建设完成。在宜昌的城市变迁史上，这个工程，被视作是宜昌的第一次振兴。

宜昌市面积和城区面积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34平方公里、2平方公里，扩展到1988年的330平方公里、28平方公里。这期间，大量工程建设者及其家属迁入宜昌，城市人口从1949年的7万多人，增加到1988年的42.95万人。

宜昌从一座小城市，迅速发展成一个工业门类齐全的中等城市。葛洲坝水力发电厂推动着工业经济的快速发展，电力产业成为宜昌工业的第一支柱产业，国民生产总值从1970年的0.57亿元增长到1988年的17.1亿元，年均增长20.8%。

1994年12月，中国人“梦想百余载”的三峡大坝正式开工，宜昌迎来发展史上的第二次振兴。2009年，工程建成，开始全面发挥防洪、发电、航运、补水等综合效益，“高峡出平湖”，从诗人的浪漫想象，变成了美丽的现实。

一组数据见证了三峡工程带给宜昌的“华丽变身”：从三峡工程开工建设到近几年，宜昌城区面积由30平方公里增长至160多平方公里，GDP由103亿元跃升至3857亿元，城市人口增加到410多万人。宜昌从中等城市发展成为大城市。

绿色发展的“新考题”

夜色渐深时，江边人群散去，江面上一艘挂满霓虹灯、满载游客的小游轮，在轰轰前行的货轮中，缓缓驶入港口。

这座追求宜居、宜旅、宜业的宜昌，正在努力地向外界展示它的发展活力和独特魅力。2017年，有6618万人次的游客来到宜昌，给它带来713.46亿元的收入。一批科技产业园、专业化工业区正在加速建设，过去一年里，新材料、生物医药、电子信息、先进装备制造业的产值，已经占到宜昌工业总产值的40%。

然而在过去，宜昌经济的快速发展，也让长江经历了不可承受之“环境之痛”。

作为宜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见证者，李泉曾在当地担任过化工厂厂长。据他介绍，由于水资源丰富、长江运输便利，加之化工产品附加值高、衍生品多，产业链长，对GDP的拉动效应相对明显。自上世纪60年代末到90年代，宜昌大力发展化工产业，甚至到本世纪初还在加紧建设化工厂。

过去很多年，电力、化工、食品医药成为当地的三大支柱产业，占到工业总产值的一多半。“以前流行三个三分之一”的说法，湖北全省化工业产值三分之一在宜昌，宜昌化工业产值占到全市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一，三分之一化工企业在沿江。”李泉说。

化工产业给宜昌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，也造成了当地的环境污染。一些地方的污水排放，也给长江的生态环境带来严重隐患。

如何求解“化工围江”的困局，践行绿色发展理念，一度成为这座城市的“新考题”。

近些年，在中央提出的长江经济带战略下，宜昌正在下大力度做好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工作，在“去工业、去产能”的决策中，宜昌134家化工企业“关、停、搬”，首批依法关停企业25家，并出台化工产业专项整治方案和三年行动方案，规划建设宜都、枝江专业化工业园区，沿江“一公里保护红线”正在形成。

在湖北省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方案中，以武汉为中心，襄阳和宜昌两个省域副中心城市，成为湖北的“两翼”。宜昌既要通过发展先进装备制造、新材料、新能源和节能环保、旅游业等产业做大做强，又要增强区域辐射和带动能力，承担起在鄂西南带动“两荆”、辐射恩施的历史重任。

2018年的宜昌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出，今年要致力加快新旧动能转换，坚持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“双轮驱动”，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培育“双措并举”，让新动能尽快成为主导力量。

这座城市在用实际行动交出一份“绿色发展”的答卷。

(稿件部分内容参考：李敏昌主编《宜昌城市社会变迁史》、莫玉蓉《卢作孚：民国一代船王》、张守广和项锦熙主编《卢作孚全集》、徐凯希论文《近代宜昌转运贸易的兴衰》、黄石市档案馆馆藏纪录片《黄石的抗战·西迁壮歌》)

档案背后的第5期 湖北故事

新华每日电讯 湖北省档案局(馆) 合办